

东越墓葬分期及相关历史考古问题

付琳

关键词：浙江南部及福建 东越遗存 墓葬分期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KEYWORDS: Southern Zhejiang and Fujian Eastern Yue Remains Tomb Periodization Late Warring States through Early Western Han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through the early Western Han periods, there were two political entities in southern Zhejiang and Fujian provinces: Donggou and Minyue. Their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re both identical in appearance and quite unique, and thus they can collectively be referred to as Eastern Yue remains. Through typological study of typical pottery assemblages unearthed from tombs, the Eastern Yue tomb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end of Warring States through the Qin Dynasty,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through the reigns of emperors Wen and Jing of Han, and the reigns of emperors Wen and Jing of Han through the first year of Emperor Wu's Yuanfeng reign. In addition, Eastern Yue tomb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erarchies based on scale. Through analysis of cultural attributes such as tomb type, grave goods, and funerary custom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Eastern Yue remains include the cultural elements ranging from the Yue state to the Han culture to idiosyncratic and innovative cultural attributes. Through analysis of both thes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this study fully addresses issues such as ethnicity, state, state capital, changes of political regime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routes in the region.

历史文献对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实际统治福建与浙南的地方政权——闽越、东瓯两国记载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记·东越列传》^[1]。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将东越与南越并举，有关东越的记载基本照录《史记》。从文字史料分析，无诸与摇对东越地区的统治应早于秦统一之时。相关考古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末调查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至今不断丰富，特别是墓葬资料已有较多积累，是探研东越历史问题的重要线索。吴春明认为以福林岗墓葬和城村汉城遗址主体遗存为代表的福林岗类型，是福建东周末至西汉时期土著闽越人

的文化^[2]。21世纪以来，在浙江温岭大溪古城及东瓯国墓葬所见的文化面貌与福林岗类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杨哲峰指出“秦至西汉前期，东瓯和闽越在文化上的确具有很强的共性”，与同期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所见文化不同^[3]。综合以上，可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分布于浙江南部、福建全境及邻近地区属于东瓯国和闽越国的考古遗存统称为东越遗存。以往学界对于东越遗存的分期研究不够充分，本文主要从东越墓葬的分期断代和文化因素分析入手，探讨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

作者：付琳，福建省厦门市，361005，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

一、典型陶器类型分析与东越墓葬分期

可供研究的东越墓葬主要有浙江温岭塘山M1^[4]与M2^[5]、元宝山M1与M2^[6]，福建福州益凤山M1^[7]、洪塘金鸡山M22^[8]，武夷山牛山M1^[9]、新亭园M1~4^[10]、牛栏后M1与M2^[11]、蛇子山M2与M4^[12]、亭子后M1^[13]、斧头山M1^[14]、福林岗M1及渡头M1~4^[15]，浦城金鸡山M1与M2^[16]、龙头山M1、M2、M4与M60^[17]、越王山M1^[18]，邵武斗米山M29^[19]和长泰石牛山M1^[20]等。

(一) 典型陶器类型分析

目前发现的东越墓葬通常已被盗扰，但随葬陶器大多保留了下来，基本陶器组合仍然可辨，即甗、小罐、瓮、鼎、匏壶、薰炉、敛口钵和圜底釜，陶盅、杯、璧、角形器和纺轮也比较常见，少数贵族墓的陪葬器物坑中见有仿铜陶质乐器。随葬陶器质地以硬陶为主，亦见部分泥质软陶和夹砂陶，原始瓷数量很少，罕见高温钙釉陶。

在随葬陶器组合中，匏壶、甗、鼎、薰炉、小罐和瓮的演变规律较为明确，可做型式分析以为墓葬分期提供主要依据。

匏壶 多为泥质硬陶，有少量原始瓷或泥质陶。整体形如匏瓜，小口，扁腹，平底或微内凹，肩有对称的桥形双耳。部分耳上附贴卷云泥条装饰，腹部多饰弦纹或水波纹，也见少量装饰锥刺斜向篦点纹及戳印月牙纹者。匏壶在东越墓葬中较为常见，通常一墓随葬1件。塘山M1较为特殊，随葬5件。可据腹部形态差异，分为两型。

A型：腹部较浅，可分三式。

I式：敛口，斜颈，溜肩。塘山M1：29，高17.2厘米（图一，1）。

II式：直口，斜颈，广斜肩。福林岗M1：8，高18.9厘米（图一，2）。

III式：口微侈，长直颈，广弧肩。蛇子山M2：3，高19厘米（图一，3）。

B型：腹部较深，可分三式。

I式：敛口，斜颈，溜肩。金鸡山M2：2，高21厘米（图一，4）。

II式：直口，斜颈，弧肩。牛栏后M1：25，高19.6厘米（图一，5）。

III式：直口，长直颈，广弧肩。蛇子山M4：10，高18.6厘米（图一，6）。

A、B两型匏壶演变趋势相近，均为口部由敛口到直口，颈、腹分界逐渐明显，颈部渐直、渐细长。

甗 多为泥质硬陶。侈口，扁腹，平底或微内凹，肩有对称的桥形双耳。部分耳上附贴卷云泥条装饰，腹部多饰弦纹或水波纹，也见少量锥刺斜向篦点纹与前两者组合饰于一器。甗在东越墓葬中常见，通常一墓随葬1件，个别墓葬随葬2件。陶甗在江南地区周代土墩墓中也很常见，但形制有所不同。据腹部形态差异，分为两型。

A型：腹部较浅，器形偏矮胖。可分三式。

I式：广斜肩，斜腹。塘山M2：8，高14.2厘米（图一，7）。

II式：广弧肩，斜弧腹。龙头山M1：5，高14.8厘米（图一，8）。

III式：广平肩，斜弧腹。蛇子山M2：2，高17.8厘米（图一，9）。

B型：深腹，器形偏瘦高。可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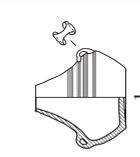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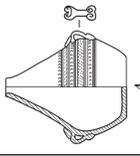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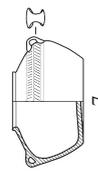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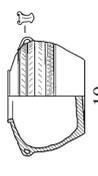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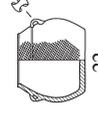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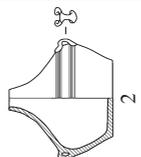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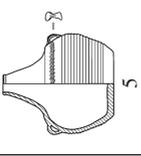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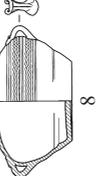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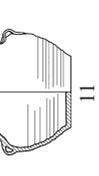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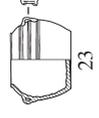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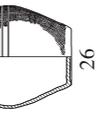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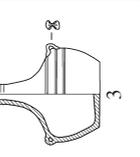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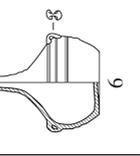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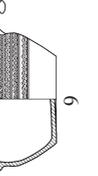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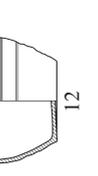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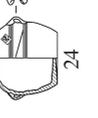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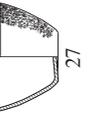
I式：斜肩，斜腹。龙头山M60：3，高14.5厘米（图一，10）。

II式：斜弧肩，斜弧腹。牛栏后M1：24，高18.6厘米（图一，11）。

III式：平肩，斜腹。蛇子山M4：9，高17厘米（图一，12）。

A、B两型甗的演变趋势相近，均为肩部由斜渐平；腹部纹饰由锥刺斜向篦点纹与弦纹、水波纹组合，到弦纹或弦纹与水波纹组合。

鼎 均为夹砂硬陶。较为常见。据整体形态差异，分为两型。

	匏壶		甗		薰炉	小罐	瓮
	A型	B型	A型	B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图一 东越墓葬随葬典型陶器分期图

1~3.A型I~III式匏壶(塘山M1:29、福林岗M1:8、蛇子山M2:3) 4~6.B型I~III式匏壶(金鸡山M2:2、牛栏后M1:10) 7~9.A型I~III式甗(塘山M2:8、龙头山M1:5、蛇子山M2:2) 10~12.B型I~III式甗(龙头山M60:3、牛栏后M1:24、蛇子山M4:9) 13~15.A型I~III式鼎(金鸡山M2:19、牛栏后M1:1、新亭园M2:12) 16~18.B型I~III式鼎(金鸡山M2:13、牛栏后M1:14、牛山M1:21) 19~21.I~III式薰炉(金鸡山M2:32、牛栏后M1:15、新亭园M2:4) 22~24.I~III式小罐(塘山M1:9、金鸡山M1:2、牛山M1:4) 25~27.I~III式瓮(塘山M1:5、龙头山M2:1、牛山M1:19)

A型：甗形鼎。盘形敞口，束颈外侧附对称的环形或半环形双耳。该型鼎在江南地区战国时期越国墓葬中很常见。可分三式。

I式：垂腹，底内凹，底部有三个八棱柱状足。金鸡山M2:19，高32厘米(图一，13)。

II式：弧腹，圜底，底部有三个六棱柱状足。牛栏后M1:1，高25.2厘米(图一，14)。

III式：弧腹，圜底，底部有三个矮圆柱状足。新亭园M2:12，高22.2厘米(图一，15)。

B型：带盖盒形鼎。拱形盖上附桥形钮；鼎身子口，上腹外侧多附对称的长方形耳，少量附对称的环形耳，平底或微内凹。该型鼎在战国时期越国墓葬中也有随葬，是模仿楚文化陶鼎的器形。可分三式。

I式：扁弧腹略垂，底部有三个八棱柱状足。金鸡山M2:13，通高31厘米(图一，16)。

II式：弧腹，底

部有三个六棱柱状足。牛栏后M1:14, 通高21.8厘米(图一, 17)。

Ⅲ式: 弧腹, 底部有三个矮圆柱状足外撇。牛山M1:21, 残高23厘米(图一, 18)。

A、B两型鼎总体演变趋势相近, 均为由垂腹至弧腹; 足由棱柱状变为圆柱状, 由高渐矮。此外, B型鼎足存在由直立向外撇的发展趋势。

薰炉 均为泥质硬陶。由盖和器身组成。拱形盖, 钮大多作鸟形, 盖呈母口, 盖面饰成组的三角形镂孔, 另饰有刻划纹饰。器身为豆形, 子口, 折腹, 圈足。器身上部刻划回纹或刻镂三角形纹, 部分加锥刺纹, 工艺精致。薰炉在江南地区周代土墩墓中未见, 是东越墓葬中新兴的器形, 分布较为普遍。通常一墓随葬1件, 金鸡山M2较为特殊, 随葬3件。可分三式。

I式: 器身上腹较直, 下腹斜折, 喇叭状圈足较高, 上有一周凸棱。金鸡山M2:32, 通高10.2厘米(图一, 19)。

Ⅱ式: 器身上腹较直, 下腹斜折, 喇叭状圈足。牛栏后M1:15, 通高9.6厘米(图一, 20)。

Ⅲ式: 斜折腹, 矮圈足。新亭园M2:4, 通高8厘米(图一, 21)。

薰炉的演变趋势为器形由瘦高渐矮胖, 圈足由高渐矮。

小罐 多为泥质硬陶, 也见少量软陶。敛口, 弧腹, 平底或微内凹, 上腹部有对称的桥形双耳。小罐在东越墓葬中常见, 通常一墓随葬多件, 少数为一墓1件, 数量多寡可能与墓葬级别呈正相关, 所见最多者为金鸡山M2, 随葬14件。其器形可能源自战国时期越国墓葬中的敛口小罐, 但质地、纹饰均有显著差别。可分三式。

I式: 弧腹近垂。通体拍印方格纹, 上腹部抹去一周形成凹旋纹。塘山M1:9, 高14.9厘米(图一, 22)。

Ⅱ式: 弧腹。腹饰三组平行弦纹, 每

组四道。金鸡山M1:2, 高14厘米(图一, 23)。

Ⅲ式: 腹微弧, 最大径居上部。上腹饰两组平行弦纹, 每组五道, 其间存一道斜向弦纹, 另见戳印文字者。牛山M1:4, 高13厘米(图一, 24)。

小罐的演变趋势为最大腹径由下逐渐上移, 装饰由以拍印方格纹为主到以刻划多组弦纹为主。

瓮 均为泥质硬陶。器形大, 侈口, 器身最大径居于肩部, 平底或微内凹。通体拍印方格纹, 通常在上腹部抹去数道方格纹形成凹旋纹。瓮在东越墓葬中常见, 一墓随葬1件, 其体量大小可能与墓葬级别高低呈正相关。陶瓮在江南地区周代土墩墓中也很常见, 但形制有差异。可分三式。

I式: 广圆肩。塘山M1:5, 高58厘米(图一, 25)。

Ⅱ式: 广弧肩。龙头山M2:1, 高37.4厘米(图一, 26)。

Ⅲ式: 溜肩。牛山M1:19, 高59厘米(图一, 27)。

瓮的演变趋势为肩部由较为丰满的圆弧渐至斜溜。

(二) 东越墓葬分期

东越墓葬出土典型陶器中A型I式、B型I式匏壶, A型I式、B型I式甗, A型I式、B型I式鼎, I式薰炉, I式小罐和I式瓮经常共出, 可归为第一期。本期部分墓葬随葬的硬陶盅与战国时期越国墓葬随葬的同类器十分接近, 随葬品中尚存少量原始瓷器。硬陶小罐以拍印方格纹为主, 也见少量弦纹小罐。在硬陶器上使用锥刺的斜向篦点纹, 为本期重要的装饰特征。第一期东越墓葬主要有金鸡山M2、龙头山M60、塘山M1与M2、元宝山M1与M2。

A型Ⅱ式、B型Ⅱ式匏壶, A型Ⅱ式、B型Ⅱ式甗, A型Ⅱ式、B型Ⅱ式鼎, Ⅱ式薰炉, Ⅱ式小罐和Ⅱ式瓮经常共出, 可归为第

二期。在本期随葬品组合中硬陶敛口钵业已取代盅成为主流，另以随葬弦纹小罐为主。第二期东越墓葬主要有龙头山M1、M2、M4，越王山M1，金鸡山M1，牛栏后M1，斧头山M1，福林岗M1，渡头M1，斗米山M29，益凤山M1和金鸡山M22。需要指出的是，益凤山M1虽属于本期，但随葬品中延续了部分第一期器物，如成组的硬陶盅，其年代在本期墓葬中应属偏早阶段。

A型Ⅲ式、B型Ⅲ式匏壶，A型Ⅲ式、B型Ⅲ式甗，A型Ⅲ式、B型Ⅲ式鼎，Ⅲ式薰炉，Ⅲ式小罐和Ⅲ式瓮经常共出，可归为第三期。本期以随葬弦纹小罐为主，牛山M1出土的部分弦纹小罐上带戳印文字，除在上腹部饰两组平行弦纹外，也见在上、下两组弦纹之间饰斜向弦纹者，类似小罐在城村汉城遗址中较常见^[21]。第三期东越墓葬主要有牛山M1、新亭园M1~4、蛇子山M2与M4、亭子后M1。

石牛山M1和牛栏后M2未出典型陶器，从所见硬陶敛口钵等遗物的形态分析，应属于第二期或第三期。

二、庄边山墓地与东越墓葬的比较及断代

闽侯庄边山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遗址上层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墓葬9座，通常称之为庄边山墓地，其文化性质与东越墓葬有差别。欧潭生认为庄边山墓地为战国晚期楚墓^[22]，林忠干、吴春明、王振镛等判断其年代为秦末汉初^[23]。林公务将庄边山墓地分为两期，M16、M33为第一期，M47、M49、M50为第二期，M18、M35、M39兼有两期特征，归入第二期，并认为第一期墓葬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第二期墓葬年代为秦末至西汉早期^[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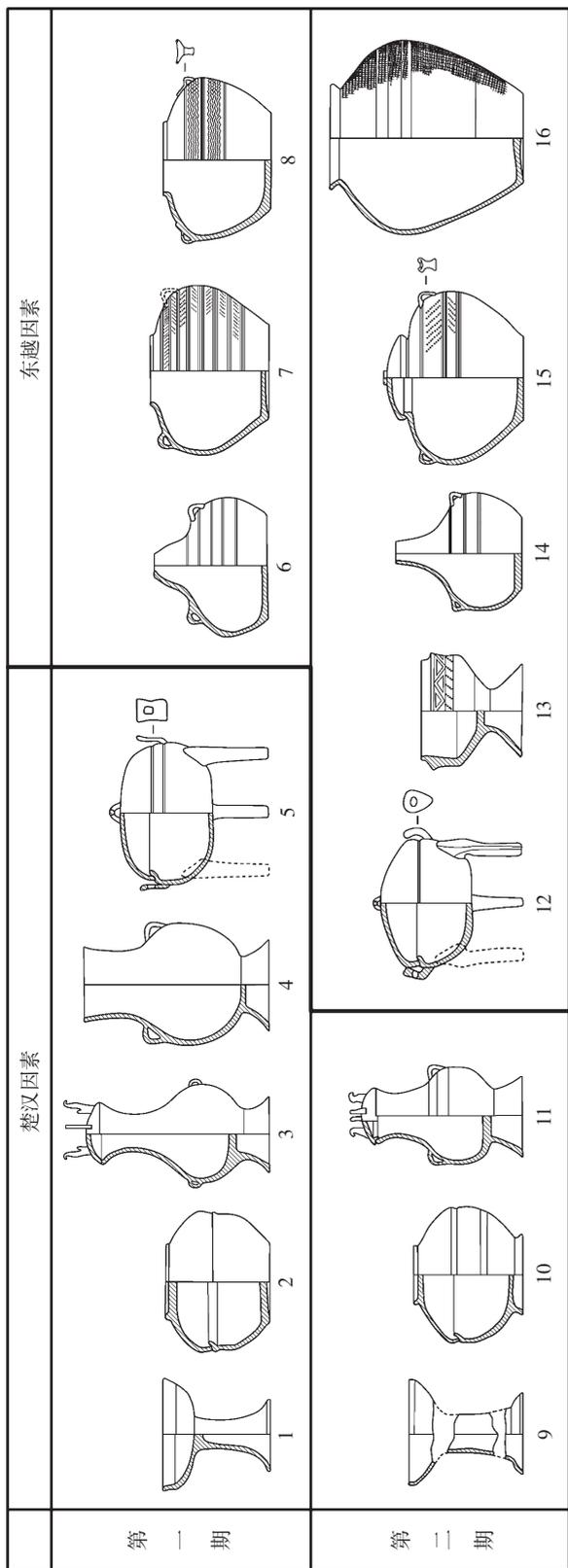
庄边山墓地以随葬楚式的鼎、豆、盒、壶为基本陶器组合，但各墓中伴出有部分东越墓葬的典型陶器。庄边山M3、M16、M33

中出土前文所分的A型Ⅰ式匏壶，A型Ⅰ式、B型Ⅰ式甗和B型Ⅰ式鼎，虽然所出土陶鼎均为泥质或夹细砂软陶，与东越墓葬出土的硬陶鼎质地不同，但器形相同。庄边山M18、M35、M39、M47、M49、M50中亦出少量东越墓葬第一期典型遗物，共出的主要是第二期典型陶器中的B型Ⅱ式匏壶，A型Ⅱ式、B型Ⅱ式甗，Ⅱ式薰炉，Ⅱ式瓮和B型Ⅱ式鼎，其中M35、M47、M50出土陶鼎皆为夹砂灰硬陶，质地与第二期东越墓葬所出陶鼎相同。从庄边山墓地的布局来看，第一期墓位于山岗中部，第二期墓位于其南、北两侧。庄边山墓地第一、二期墓葬的年代应分别与第一、二期东越墓葬相当，其中东越遗存文化因素所占比例有上升的趋势（图二）。

通过对东越墓葬和庄边山墓地的分期，结合与周边地区相关遗存进行比较，可对各期绝对年代的大致范围加以推断。

第一期墓的年代上限因本区战国时期墓葬资料十分缺乏而难以准确推定。福建长泰犁头山M1出土米字纹陶罐、三乳丁足小罐和原始瓷盅^[25]，年代可大致断在战国早中期。其随葬品组合与东越墓葬差异明显，可推断第一期东越墓葬的年代晚于犁头山M1。第一期东越墓金鸡山M2出土的A型Ⅰ式、B型Ⅰ式陶鼎及盃（M2：23）、洗（M2：25）与江西贵溪水岩M10出土的同类器形制相近^[26]，但纹饰差别较大，水岩M10年代为战国早期。与金鸡山M2：23陶盃器形较接近的原始瓷盃见于江西玉山窑山M1^[27]，该墓年代亦为战国早期。金鸡山M2中所见组玉佩上的谷纹、涡纹、勾云纹等风格属于战国特色，其中玉璧（M2：35、36）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玉璧（M2：15）形制相近^[28]。另外，年代约属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广东肇庆北岭松山M1随葬原始瓷甗（M1：109）亦饰斜向篔点纹^[29]，器形也与A型Ⅰ式甗相同。

庄边山第一期墓出土陶鼎、豆、盒、壶的形制与江苏苏州小真山D4M3中同类器



图二 庄边山墓地出土陶器分期与文化因素对比

1、9.豆 (M16:6、M50:15) 2、10.盒 (M16:10、M50:11) 3、4、11.壶 (M33:8、M16:1、M50:4) 5、12.鼎 (M16:8、M50:8) 6、14.靴壶 (M16:3、M18:2) 7、8、15.甗 (M16:4、M33:9、M50:2) 13.薰炉 (M35:8) 16.瓮 (M35:1)

基本一致，该墓年代属于战国晚期偏晚^[30]。因所出铜镜 (D4M3:16) 纹饰为战国晚期秦镜特有的抽象菱形凤鸟纹^[31]，亦不排除年代已进入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 以后。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小真山顶部的战国晚期墓D1M1出土“上相邦玺”，推断墓主或为楚相春申君黄歇，黄歇于战国末期受封于江东，卒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 (公元前238年)^[32]。综上可知，第一期墓葬的年代大致为战国末期至秦代。

第二期墓的年代上限紧承第一期墓。庄边山M47出土陶鼎、盒、壶的形制与上海青浦福泉山M2出土同类器基本一致^[33]，有学者推断福泉山M2年代为秦代^[34]。庄边山M49、M50出土陶壶与湖南长沙马王堆M1:307陶壶、江苏扬州刘毋智墓M1C:10釉陶壶器形相近，庄边山M49:7陶盆与刘毋智墓M1C:106陶盆形制接近。本期流行的Ⅱ式陶薰炉也与马王堆M1:433、M3:北167陶薰炉形制相近。马王堆M1、M3年代在西汉文景帝之间^[35]，刘毋智墓年代很可能介于汉高祖八年 (公元前199年) 至景帝前元三年 (公元前154年) 之间^[36]。可知第二期墓葬年代大致在秦末至西汉文景帝之间。

第三期墓的年代上限紧承第二期墓。Ⅲ式薰炉、B型Ⅲ式鼎、釜的形制以及牛山M1出土Ⅲ式小罐上带戳印文字的做法均与南越国后段墓随葬陶器的特征相符，南越国后段墓年代为西汉文景帝之间至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

前111年)^[37]。A型Ⅲ式鼎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C11陶鼎形制相近，B型Ⅲ式鼎与南越王墓出土H42陶鼎相似。南越王墓中随葬的铜勾鑿带“文帝九年”铭刻，可知墓葬年代晚于此。学界对该墓墓主身份虽有争论，但这代南越王应下葬于汉武帝即位前期，即在不早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不晚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之间，也符合由陶器推断该墓属于南越国后段墓的认识^[38]。

第三期东越墓葬的年代下限应难以进入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平灭闽越国之后。通过对城村汉城北城门开展考古发掘，显示城门废弃与大火焚烧有关，城内及城门遗留大量可资重复利用的金属兵器，也表明城址突遭废弃的状态。城村汉城遗址出土炭化稻和炭化竹篾的测年数据与该遗址出土铁器测年相符，经校正后年代下限均早于公元前100年^[39]，为城址的突然废弃与武帝元封元年平灭闽越国的关联提供了年代学佐证。依常理推断，特征明显的东越贵族墓在此之后难以延续发展。区内所见福州洪塘金鸡山M9^[40]、闽侯庙后山M1与M4^[41]、光泽凤林山M1^[42]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墓葬，随葬釉陶器和模型明器等汉式器物所占比例较高，与第三期东越墓葬的文化面貌判然有别。综合以上，第三期墓葬年代大致处于西汉文景帝之间至武帝元封元年。

三、文化因素分析及相关历史问题

（一）文化因素分析

在开展文化因素分析前应注意到东越墓葬的规模存在明显差别，大致可分作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墓包括塘山M1、益凤山M1和牛山M1。这级墓葬的墓上有体量巨大的长方形覆斗状封土。墓坑总长度最短的益凤山M1有24.5米，最长的牛山M1达32米。墓坑均打破生土甚至基岩，最浅的塘山M1深3.7米，

最深的牛山M1达7.7米。均带单斜坡墓道。分别属于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益凤山M1与牛山M1在墓道与墓室之间有甬道，甬道内存在外藏椁箱，墓室内的前椁室为矩形箱式木椁，后椁室即主椁为“人”字顶木椁。第一期的塘山M1木椁也分前、后两室，应均为矩形箱式木椁，在该墓封土边缘外还发现一处放置仿铜陶质乐器的陪葬器物坑。

第二等级墓以金鸡山M1、M2，龙头山M4、M60，牛栏后M1、M2，新亭园M1~4、亭子后M1、斧头山M1和蛇子山M2、M4为代表。这级墓葬的墓上亦多有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但规模较第一等级小。均带单斜坡墓道，无甬道，墓坑总长度在7.7~19米之间，墓坑深度在1.3~3.6米之间。墓室底部常见平行的枕木沟槽，推测木椁当为矩形箱式，分前、后两室，前室稍窄于后室。部分墓坑较浅者，墓底存在局部铺河卵石的现象，如亭子后M1。第二等级墓葬之间或可再行细分，如同处城村汉城周边的牛栏后、新亭园等墓地所见墓葬之规模明显大于亭子后、斧头山、蛇子山墓地。但在缺少完整随葬品组合佐证的情况下难以落实。

第三等级墓以斗米山M29和福林岗M1为代表，渡头村M1~4、龙头山M2大致也当归入此级。这级墓葬是否有墓上封土已不可考，均无墓道，长方形墓坑，墓坑长3~5米，深度通常较浅，墓底铺河卵石，尚难断定是否存在葬具，随葬品通常置于墓底西侧。

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和葬俗分析，东越墓葬中有明显继承战国时期越国墓葬的文化因素和部分源于汉文化的因素，又具有不同于上述两者的自身特征。

1.越国文化因素 东越墓葬中展现的越国文化因素贯穿始终，在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中又有不同体现。

第一期第一等级的塘山M1墓外设陪葬器物坑，所见遗物以仿铜陶质乐器为主，这

是战国早中期越国贵族墓的重要葬俗^[43]。第二、三期第一等级的益凤山M1和牛山M1主椁形态为“人”字顶，此类木椁在同期南越国贵族墓广州农林东路M68中也有发现，其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之际的浙江绍兴印山M1、香山M1和安吉龙山D141M1等越国王室墓及大型贵族墓的椁室形态，这可能是越国高等级贵族在自身墓葬形制方面的重要发明与规定^[44]。

第三等级和部分第二等级的东越墓葬中在墓底铺河卵石的做法，虽在岭南战国至西汉前期墓葬中也有发现，但均应源自江南地区土墩墓中的石床形态。石床型土墩墓自晚商时期至春秋晚期均有一定发现。春秋晚期以后，越国贵族逐渐改用竖穴深坑墓形制，墓葬常选址于山上，墓底大多达到岩层，无需再铺石。东越墓葬中也只有浅坑墓墓底才铺石，而达到岩层的深坑墓并不铺石。此外，在蛇子山M4墓道底部两侧发现分布有较为密集的柱洞，应搭建过简易的棚状设施。类似做法在安吉龙山D141M1^[45]等越国贵族墓中也有发现，属于战国越墓的文化因素。

随葬品方面，除前述部分陶鼎、盅、盃与战国时期越国同类遗物具有亲缘关系外，在第一、二等级的东越墓葬中还见有陶角形器和陶璧，类似随葬品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明器，此前绝大多数发现于战国时期越国的大中型墓葬内^[46]，是源自战国越墓的文化因素。另外，在东越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中，陶纺轮始终占有一定比重，如塘山M1、益凤山M1、新亭园M4、蛇子山M2及越王山M1均有出土，且随葬数量似与墓葬等级呈正相关，而在庄边山墓地中全然不见此类随葬品。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经常随葬纺轮^[47]，应为这种葬俗的渊源。还有迹象显示东越贵族墓可能不流行随葬铜礼器，而流行随葬玉器，亦与越国贵族墓的葬俗传统相合。

2. 汉文化因素 《史记·东越列传》载：

“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

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藉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藉，无诸、摇率越人佐汉”^[48]，显示出东越同楚、秦、汉之间均发生过较为直接的关系，故而这里讲的汉文化因素除了新兴的汉式文化因素之外，也包括作为汉文化重要来源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楚文化因素和秦文化因素。在东越墓葬中可以明确来自汉文化的因素，主要表现在第一、二等级的贵族墓中，且从第二期才开始显著起来。

在第一等级的益凤山M1和牛山M1甬道内均见有外藏椁坑和外藏椁箱。在墓道内设外藏椁是西汉前期外藏椁三种主要形式之一^[49]。在战国时期部分越国贵族墓和第一期第一等级东越墓塘山M1墓坑之外均发现有陪葬器物坑，但并未见设于墓道或甬道之内的，故而类似做法应源于汉文化之影响。

随葬品方面，东越墓葬中所见的B型陶鼎器形源于楚文化。另外，在牛山M1前椁室内发现13件漆器的遗痕，大都是较大的长方形漆器板痕，或为类似漆榻的大型漆器之部件。在甬道中亦见到3件长方形或长条形漆器的遗痕，这应是来自楚文化或新兴汉文化的因素。龙头山M4出土的铁铤铜铤常见于城村汉城遗址。铁制品的大规模使用是东越与秦、汉、南越国开展军事活动的重要基础。鉴于本区缺少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越国常见的铜质或铁质农具和工具，推测其铁的冶铸技术源于秦、汉文化的可能性更高。

3. 土著与创新因素 东越墓葬中随葬的夹砂硬陶釜承袭了闽江流域史前及商周时期陶釜宽沿、束颈、鼓腹、圜底的器形特点，仅在质地和纹饰方面体现出时代变化，如在城村汉城遗址所见部分陶釜上有戳印的文字标记。金鸡山M2出土的带盖陶杯器形颇有黄土仑类型陶杯之遗风，器身与器盖上戳印的篦点纹和指甲纹也是具有本地先秦文化特色的纹饰。环状排列的戳印指甲纹在东越墓葬出土的陶壁上也有所见，类似纹饰基本不见

于越国文化或楚、秦、汉文化，是本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传统纹饰。

东越墓葬随葬陶器组合与同期长江下游墓葬及南越国墓葬之间均有较大差别，基本不见长江下游本阶段流行的钙釉鼎、盒、壶、甗组合，亦不见广州西汉前期墓随葬楚汉式的泥质陶鼎、盒、壶、缶组合及提桶这种非常典型的南越国器物^[50]。南越国墓葬虽亦常随葬陶匏壶，却与东越墓葬中所见匏壶属于不同类型^[51]。东越墓葬中小罐的器形或源自战国越墓的敛口小罐，但质地、纹饰均有显著差别，且常以多件随葬成为十分固定的组合，亦非越国墓葬所有。

（二）相关历史考古问题

《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52]。黄展岳认为闽越部族的建立应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败越、杀越王无疆以后，越国臣民向南流徙有关^[53]。陈元甫指出于越人群大量进入闽越之地，并逐渐成为闽越首领，应与无疆第三代孙亲败走南山的事件有关^[54]。郑小炉认为吴越人群向岭南地区的迁徙可早至春秋晚期，东越地区无疑是吴越人群向岭南迁徙的重要一站^[55]。

春秋中晚期的浦城管九村大王塝土墩墓、瑞安岱石山M33支石墓均有意识模仿越国墓葬，不过这仅代表早期“闽越”与“瓯越”社会上层对于越国贵族的学习和借鉴^[56]。类似墓葬在本区战国早中期未见延续。从邻近本区且年代属于战国早中期的江西贵溪崖葬、玉山双明镇土墩墓和浙江江山大夫第墓^[57]来看，文化面貌与东越墓葬差别较大，就随葬品而言更接近越国墓葬，由墓葬级别观之，亦缺乏贵族墓。结合第一期东越墓葬的年代上限可以推知，促使越国贵族南下的事件很可能是楚考烈王世伐越、迫使越王亲败走南山，以及春申君受封江东郡。据陈伟考证，此役之后尚有分散的越国政权存在，直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

年）王翦降越君、置会稽郡才基本结束了句践后裔对越国故土的控制^[58]。可以想见在楚威王败越之后，楚、秦对越地多次打击的过程中，越国王室的败逃很可能是多批次、多线路的。由第一期东越贵族墓浦城金鸡山M2和龙头山M60的存在，可知其中一条线路应由内陆河谷穿武夷山、仙霞岭到达闽北。由温岭塘山M1和福州益凤山M1的存在，可知另一条线路应从海路到达浙南及福建沿海^[59]。如将“人”字顶木椁墓视为越国王室葬制，则越国王室后裔一支抵达本区并建立王权，至迟在第二期偏早阶段，也可能与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降越君事件相关。

还可以结合相关城址发现对东冶与东瓯的地望问题稍加讨论。从年代学角度分析，福州屏山、浦城锦城、温岭大溪等与古城相关的遗址年代上限均早于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近年来在屏山遗址发现属于闽越国的早、晚两期夯土台基和大量高级别建筑材料^[60]，从出土与建筑相关的散水、柱础等遗迹分析，其宫室建筑与城村汉城高胡坪甲组建筑相近。屏山遗址出土的磨光黑陶双耳罐（T4：4）、盆（T4：6），与苏州小真山D2M1：1罐^[61]及上海金山戚家墩M2：43盆^[62]形制相近，年代可早至战国晚期，也有学者认为类似遗物为秦文化之因素^[63]。总之，屏山遗址所见宫室建筑的年代上限至迟在秦代，该遗址晚期夯土台基的年代同于城村汉城遗址，为东冶在福州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在屏山遗址西南部的牛头山遗址也见夯土台基与建筑构件，出土陶甗形制与第一期及第二期偏早阶段东越墓葬中常见者^[64]相近，其年代上限同于或略晚于屏山遗址，附属于屏山东冶王城的可能性较大。

年代属于第一、二期的庄边山墓地所代表的文化类型仅见于东冶附近，墓主族属应为楚人。考虑到其接受部分东越典型器物作为随葬品，并可以在东冶附近专辟墓地正常安葬，墓主与东越政权的关系应颇为密切，

其身份存在两种可能。其一，自春秋战国之际起已有不少楚人入仕越国^[65]，庄边山墓地的墓主或为其后裔，于战国末期随越国贵族南迁东越，并定居于东冶附近。其二，无诸与摇曾随鄱阳令吴芮共同叛秦佐汉，往来密切，这批居于东冶附近的楚人也可能与吴芮相关^[66]。总之，庄边山墓地的存在符合东冶作为一国都会之背景，而此恰为其他东越城址所不具备。

城村汉城遗址周边的东越墓葬自第二期开始出现，主体为第三期，城内出土遗物的年代也以第三期为主，该城使用的年代上限晚于屏山遗址殆无疑议。至第三期时城址周边分布有各等级的东越墓葬，结合城内高等级宫室建筑的存在，可以确定其作为一座王城的性质。史载闽越国存在一段二王并立的特殊时期，即约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始。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城村汉城是徐善的王城^[67]。考虑到牛山M1的年代与城村汉城遗址非常接近，虽已严重被盗，但从规格、形制分析，应为一座王陵级别的墓葬。徐善作为反汉首恶，被东越内部繇王居股和建成侯敖等人所杀，闽越国随即被灭，其应无墓。故而，有学者提出城村汉城为繇王之王城、牛山M1为繇王丑陵墓的观点^[68]，应给予重视。

温岭塘山、元宝山所见东越墓葬年代均属第一期。从出土遗物分析大溪古城址年代也基本与第一期东越墓葬相同^[69]，年代下限难以到汉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摇受汉室封立为王。并且大溪古城缺乏高等级建筑基址或建筑材料出土，城址面积有限，级别偏低，应当并非摇受封后所都之东瓯。东瓯王城的发现与确认仍待浙南地区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四、结 语

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所见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考古遗存面貌一致且颇具特色，可

以之作为一类考古学文化类型，称之为东越遗存。通过对匏壶、甗、鼎、薰炉、小罐和瓮等东越墓葬出土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可将东越墓葬分为三期，各期年代分别为战国末期至秦代、秦末至汉文景之间、汉文景之间至武帝元封元年。又可据墓葬规模将东越墓葬大致分为三个等级。对第一期东越贵族墓的辨识，以考古资料证明了无诸与摇对本区的统治先于东越受封于汉室。由文化因素分析可知，第一期塘山M1、第二期偏早益凤山M1、第三期牛山M1之形制均与越国贵族墓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史记》言东越王室为句践后裔可以采信。

闽侯庄边山墓地是与东越政权关系紧密的楚人墓葬，可以分为两期，年代分别对应第一、二期东越墓葬。与之同处于福州盆地的屏山遗址，至迟在秦代已出现高等级宫室建筑，很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闽越国都东冶。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的兴起晚于屏山遗址，或为闽越国二王并立时期繇王之王城。从年代与规格分析，温岭大溪古城并非东瓯王城。对东越遗存的发现与深入研究，将为探讨浙江南部与福建地区融入秦汉帝国的历史过程提供重要的考古学支撑。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南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项目编号18CKG009）的阶段成果。

注 释

- [1] 《史记·东越列传》第3585~3591页，中华书局，2013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2]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第112、11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 [3] 杨哲峰：《略谈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区域类型及相互关系》，《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贵族墓》，《考古》2007年第11期。
-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

- 闻出版社：《浙江温岭塘山发现西汉东瓯国墓葬》，《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 [6] 叶艳莉：《温岭元宝山发现西汉东瓯国墓葬》，见《东方博物》第36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 [7]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州市益凤山西汉闽越国墓葬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3年第3期。
- [8] 曾凡：《福州洪塘金鸡山古墓葬》，《考古》1992年第10期。
- [9]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牛山汉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8年第1期。
- [10]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武夷山市新亭园闽越国土墩墓》，《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 [11] 福建博物院汉城考古工作队：《武夷山市城村牛栏后闽越国墓葬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3年第2期。
- [12]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市蛇子山闽越国墓葬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4年第4期。
- [13]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市城村亭子后西汉闽越国墓葬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1年第1期。
- [14]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市城村斧头山一号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1年第1期。
- [15]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1980~1996）》第121、12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 [16]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浦城县博物馆：《福建浦城县金鸡山闽越墓葬发掘简报》，见《东南考古研究》第5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
- [17]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等：《福建浦城龙头山遗址秦汉时期墓葬》，《考古》2022年第9期。
- [18] 林忠干、赵洪章：《福建浦城三处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第2期。
- [19] 福建省博物馆：《邵武斗米山的汉唐遗存》，《福建文博》2002年第1期。
- [20]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发现商周、西汉墓葬》，《福建文博》2001年第1期。
- [21]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1980~1996）》第190~22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2] 欧潭生：《闽侯庄边山汉墓应为战国楚墓》，《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 [23] a.林忠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第1期。
b.吴春明：《福建秦汉墓葬文化类型及其民族史意义》，《东南文化》1988年增刊第1期。
c.王振镛：《论闽越时期的墓葬及相关问题》，《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 [24] 林公务：《福建闽侯庄边山的古墓群》，《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 [25] 同[20]。
- [26]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 [2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山县博物馆：《玉山双明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 [28]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见《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 [29] 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市文化局：《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 [30] 苏州博物馆：《苏州真山四号墩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
- [31] 高至喜：《略论秦镜及其与楚镜的关系》，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2] 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第70~7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3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1988年第8期。
- [34] 杨哲峰：《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文物》2012年第4期。
- [35] a.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57、158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b.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第238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 [36]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 [3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第462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 [3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第32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 [39] a. 葛威等：《福建武夷山市城村汉城植物考古及年代学新资料》，《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
b. 陈建立等：《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出土铁器的金相实验研究》，《文物》2008年第3期。
- [40] 同[8]。
- [41] 黄汉杰：《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6期。
- [42] 陈远志、林贤炳：《光泽县止马乡发现东汉墓》，《福建文博》1987年第1期。
- [43] 陈元甫：《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 [44] 付琳：《东南地区“人”字顶木构葬具刍论》，《东南文化》2017年第3期。
- [4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 [46] 黄昊德：《角形器功能初探》，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9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
- [47] 付琳：《土墩墓祭祀遗存考辨》，《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 [48] 《史记·东越列传》第3585页。
- [49] 李如森：《汉代“外藏椁”的起源与演变》，《考古》1997年第12期。
- [50] 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出土有少量陶提桶，但东越墓葬内不见。
- [51] 梅华全：《论福建及两广地区出土的陶匏壶》，《考古》1989年第11期。
- [52] 《史记·东越列传》第3585页。
- [53] 黄展岳：《南越、闽越和夷洲的比较研究》，《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 [54] 陈元甫：《东瓯国文化中的于越文化因素考略》，见《东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 [55]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第236、23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56] 付琳：《江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 [57] 江山县文管会：《浙江省江山县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第6期。
- [58] 陈伟：《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与杨宽等先生商榷》，《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
- [59] 除在温岭、福州所见的闽越国墓葬与遗址外，在浙江乐清排岩头、瑞安下山根也出土过A型I式陶匏壶，参见林华东：《温州通史·东瓯卷》第386~388、393、394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在闽南地区的长泰戈林山发现闽越国遗址，参见福建博物院、长泰县博物馆：《福建长泰戈林山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20年第4期。
- [60] 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西汉遗存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5年第3期。
- [61] 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第4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6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 [63] 柏宇亮：《东冶候官考》，《东南文化》2021年第2期。
- [64]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市牛头山汉代遗址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7年第1期。
- [65] 付琳：《吴越之迹：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变迁》第126~13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
- [66] 王振镛认为庄边山墓地的出现与吴芮之长沙国因无嗣而除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封子刘发为长沙王所带来的政策变化有关，推测这批楚人在此背景下来到东越。参见注释[23]c。不过，这种推测与庄边山墓地的年代上限不符。
- [67] 林忠干：《崇安汉城遗址年代与性质初探》，《考古》1990年第12期。
- [68] 吴海贵：《南越与东越的诸侯王陵墓》，《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
- [6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 李 朵）